

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

——晚清文人劉鶚的一個思想史個案考察

p. 305 - 328

陳 俊 啟

【本文提要】

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劉鶚（1857～1909）在文學史上以其小說《老殘遊記》名世，但是和其他幾位小說家吳沃堯、李伯元、曾樸相較，劉鶚在其他人生的面向上有相當突出的表現：不管在治理黃河上，建鐵道、開礦、經營實業，或是在甲骨文的蒐集研究、音律等方面都相當突出；在政治上，他也和洋務派、維新派有相當的來往；在學術思想上，他是太谷學派的嫡傳弟子。這些都使得劉鶚作為一個轉折時期的知識份子，顯得有其豐富的層面。但是劉鶚又不是所謂的「主流」知識份子，在思想、學術、社會、政治史上未能佔一重要地位。本論文以劉鶚作為取樣（sample），省視在晚清中西交流、新舊並陳的紛擾時代中，劉鶚這樣一個知識份子如何回應這多變的世局，產生何種感受。

一、前 言

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劉鶚（1857～1909），不像吳沃堯或李寶嘉，終其一生只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老殘遊記》。^①雖然在文壇上劉鶚並不甚活躍，然而從 1888 年他自

① 《老殘遊記》寫作期間在 1903～1905 年間，並在不同報章雜誌連載，最後在 1906 年連自序出版，後稱「初編」。劉鶚後來又寫了「二編」，但只寫了九回，很明顯是因政治挫折而無法繼續。在其死後劉氏家人又在 1929 年發現一些殘稿，通稱「外編」。對於「外編」殘稿的可靠性，學者意見不一致。總之，「二編」和「外編」均是未完稿。有關劉鶚小說版本的討論，可參考 Timothy Wong, "Notes On the Textual History of Lao Ts'an yu-chi," T'oung Pao LXIX, 1～3, 23～32。另亦請參考馬幼垣，《中國小說史稿》（臺北：時報出版，1980），頁 1～16。

薦入吳大澂幕府到 1909 年流放死於新疆，他卻在政壇、工商界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且有趣的角色。在這大約二十年的期間，劉鶚襄助治理黃河水患；他支持並實際參與與外人合資開礦、建鐵路，因而被稱為漢奸；他不僅與所謂的「洋務派」諸公關係密切，與「維新派」諸如梁啟超、宋伯魯等人亦有來往；他在庚子事變時入京賑災，購太倉粟以濟災民，後以此賈禍；而他與袁世凱、端方的敵對關係亦是他後來遭流放的可能原因之一。在某些方面，劉鶚是一位傳統的知識份子，在仕途不順之餘轉移其注意力於寫作、經商、貿易及古文物的研究，但是在另一方面，劉鶚卻是相當非傳統、一點都不保守，甚至與同時代的士大夫相較之下是相當激進的。無可諱言的，劉鶚不能被視為所謂的「主流人物」，因為他並沒有循中國傳統途徑，經過科考、獲致功名，然後晉身廟堂，發揮影響力——事實上他連最初級的地方科考都沒通過。^②他因治河而獲頒的「知府」銜也沒能幫助他在官僚體系中往上攀登，發揮所長。此外，劉鶚在政治、社會、哲學思想上，不管在廣度或深度上都無法像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等人，對於同時代人或後世人有所影響——也許唯一的例外是他對於甲骨文的收集、保存及解讀，以及《老殘遊記》在晚清小說發展史上的貢獻。^③雖然如此，由於其小說相當程度地反應了劉鶚對於當時社會政治的看法，由於劉氏所從事的社會、商業等活動的時期恰好是中國歷史上最詭譎多變、最複雜、也最有趣的時代，劉鶚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個例，來省視在這樣的時代中，一位知識份子如何因應時代，如何與時代互動。換言之，劉鶚係一位生存在相當複雜的歷史政治情境中的知識份子，而他對於此一境況的反應極為有趣，值得我們去留意。本論文以劉鶚為考察的對象，省視劉鶚一生重要的行徑及思想，以及其多采多姿的事業，進而探討當知識份子面臨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如何尋求生命的價值及意義，如何竭盡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來關懷綢繆的國是，如何發揮自我所長，試圖協助中國因應時勢，邁入現代。

② 在中國社會階級文化中，如未能通過科考，基本上不能獲得一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管道來實踐個人抱負，進而經世濟民，也就是無法成為「主流人物」。請參看汪容祖〈論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中對「邊緣人」的討論，收於氏著《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1983），頁 83~84。

③ 胡適在評述劉鶚時，提出其生平「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的辨認，三是請開山西的礦，四是賤買太倉的米來賑濟北京難民。」見胡適《老殘遊記·序》，見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 371。

由於劉鶚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因此在處理劉鶚時，我們恐怕不能以一般思想史上的方法來處理之。根據思想史學者張灝先生的看法，思想史有兩類：一類是觀念發展式的思想 (history of ideas)，主要的目的是「看觀念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而分析這些觀念間的衍生與邏輯關係，探討這些觀念與其他觀念之間所產生的緊張性和激盪性。」在這個趨向裡最有名的是 Arthur Lovejoy 的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存在的鎖鏈) 及 Anders Nygren 的 *Agape and Eros* (論愛)。另一類處理的方式則是將研究對象的思想「放在他的時代脈絡裡去看，看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對時代的刺激性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覺的反應。」^④張先生在處理譚嗣同時即採取了後面一種方法。美國思想史家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在討論思想史的觀念時，也認為較可取的策略是「處理人們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有意識的回應」(to think in terms of men's conscious responses to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⑤而其中最重要的，首先是情境的發生，然後是其人「有意識」的回應。這種有意識的回應，有時候是一種思想，或是意識型態上的回應，但是有時候也可以是較為個人、主觀的情感、感受上的回應。

由於劉鶚，如上文所提及的，在思想史上沒有像康有為、章太炎等人，於先人的學術思想有所傳承，並且對當代及後代有相當大的啟發與影響，因此我們很難用思想史、學術史、社會史或政治史上的標準來衡量劉鶚。不過一個知識份子，歷經傳統學問的涵育，因為時局的巨大變化而有新體會，進而會有所回應、有諸多感受；我們由此角度來看待之，可以更深入地瞭解晚清的時局以及劉鶚這個人的種種面貌。

筆者在本文中大致上係以劉鶚的生平行徑為經，擇其重要者加以演繹，試圖追繹其意涵，本質上是個案探討中資料的初步匯集整理及解讀，是一種類似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所謂的「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⑥將劉鶚的言談、作為、思想視作劉鶚個人有意識的對時代做出回應，而試著解讀在此種回應中可能含有的意義。至於對於劉鶚其人、其事、其文整體性的評估則非本文意圖所在，有待後續更深入的整體性考察。

④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1988)，頁3~4。

⑤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John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6,17.

⑥ 參見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第一章。也請參看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第一章。

二、由河工到建鐵道

根據《丹徒縣志摭餘·劉鶚》：

劉鶚字鐵雲，候選道。生平學術淵深，通曉洋務。光緒庚寅，經魯撫張曜奏調辦理河工，熟諳機器、船械、水學、力學、電學、算學、測量學等藝，著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術》、《歷代黃河變遷圖考》、《鐵雲藏龜》、《鐵雲藏陶》多種。^⑦

劉鶚原名孟鵬，字雲搏，又字公約，後改名鶚，別署鴻都百鍊生，原籍江蘇丹徒（今鎮江）人。父劉成忠，字子恕，咸豐壬子進士，歷官御史，授河南歸德府知府，調補開封府，講求治河之策。劉家歷來為官者稀少，除劉成忠的曾祖劉姜田於乾隆年中過舉外，沒有其他人當過官，所以劉成忠說：「吾家自祖父以來皆貧甚」。^⑧劉鶚於 1857 年出生於這樣的低階官僚家庭，時劉成忠已四十歲。劉鶚屬於康有為、袁世凱那一代。^⑨根據《老殘遊記·自敘》，劉鶚是位充滿情感、關心國是的讀書人：

吾人生今之世，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⑩

此種深深蘊含的強烈情感及以家國、社會、種教為己任的使命感，促使劉鶚在年輕時即與許多各行各業的人士廣泛接觸，以備日後圖謀大事之需。根據劉氏三子劉大紳，劉鶚「少年時，負奇氣，性豪放，不規規於小節。……蒿目時艱，隱然有天下已任意。故所在輒交其才俊，各治一家言。」^⑪羅振玉在《五十日夢痕錄》中的〈劉鐵雲傳〉亦提到劉鶚年輕時不為小節所拘，以「經世」為職志，不汲汲於宦途：「君……精疇人術，尤

⑦ 《劉鶚傳》載《丹徒縣志摭餘》卷八，轉引自《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305。

⑧ 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與父親劉成忠〉，《劉鶚小傳》（天津：天津人民，1987），頁 68。

⑨ 康有為出生於 1858，袁世凱 1859，梁啟超 1873。劉鶚出生這年，李鴻章三十五歲，張之洞則是二十一歲。

⑩ 筆者使用之版本為劉鶚，《老殘遊記》（臺北：聯經，1976），頁 2。

⑪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遊記》，頁 314。本文完成於 1936 年，後來刊載於《宇宙風乙刊》20 至 24 期（1940 年 1 月～5 月）。本文作者劉大紳為劉鶚三子，加註者為劉鶚孫子劉厚澤，係研究劉鶚最權威、最可靠的傳記資料。我使用的聯經版亦收有此文。在第六節「遊記作者被禍始末」中的註一，大紳提到：「先君當時交遊中，如柴某專治理財，賈某專治推步，王某專治兵略，又一王某專治拳勇，均造詣極深。」見《遊記》，頁 316。

長於治河。顧放曠不守繩墨，而不廢讀書。……是時君所交皆里井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閉戶斂跡者歲餘。」^⑫在家庭壓力下，劉鶚嘗參與科考，不上第，回到家鄉淮安後，潛心研究學問，尤以經世之學與家學（治河、曆算、音律等）為重。^⑬

劉鶚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當然是在他二十歲科考落第那年（1876）與太谷學派創始人周谷的弟子李光圻的邂逅，此後劉鶚執弟子禮，成為李光圻的入門弟子。（劉鶚與李光圻及太谷學派之關係，我們下面再回來詳細討論。）在1886年，劉鶚又參加了一次科考，不過這次他根本沒有完成考程就放棄了。看來劉鶚在此時大致已下定決心，日後的前途不會是在官場，因為從此以後，劉鶚將自己投身於一些非傳統的事業如印刷、書局等。^⑭這些事業大致上是劉鶚所謂的「養民」事業。^⑮

雖然如此，在劉鶚真正地投入「養民」事業之前，他自我推薦到河南吳大澂處去協助治理黃河河患。由於家學淵源，^⑯劉鶚在河工上頭，表現得極為優秀，不僅有治河理論及方法，還親自參與工事，「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為之事，悉任之。」^⑰在大家努力之下，黃河潰堤氾濫之情形終於得到改善，大堤終於合龕。劉鶚名列獎賞名冊上，不過他卻把功績讓與其兄，而請歸讀書。劉鶚治河名聲鵲起，之後與預了不少與黃河有關之工作。比方說，吳大澂曾奏請籌河圖局，任劉鶚為測繪「豫、直、魯三省黃河圖」提調；後來山東巡撫張曜亦發佈劉鶚為黃河下游提調。在山東期間，劉

⑫ 轉引自胡適亞東版《老殘遊記·序》，收於魏紹昌，《老殘遊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88。以下簡稱《資料》。

⑬ 參看蔣瑞雪《劉鶚年譜》，收於《資料》，頁141。亦參看《劉鶚小傳》，頁196。

⑭ 劉鶚所創辦的石昌書局是中國第一家採用石印技術的書局。參看《年譜》，《資料》，頁146。

⑮ 在一封致同門師兄黃葆年的信中，劉鶚分析了他和黃葆年職志的不同：「聖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公以教天下為己任，弟以養天下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為之。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同為空同之子孫，同培古今之道脈，同身同命，海枯石爛，無有貳心。」見《致黃葆年》（1902），《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300。有關劉鶚養民思想，見下文的討論。

⑯ 這方面可以參看《小傳》中的《劉鶚與治理黃河》中的討論。劉成忠曾撰有《河防芻議》，劉鶚本人則有《治河五說》及《續二說》二書，其中包括了《河患說》、《河性說》、《治河說》、《估費說》、《善後說》及《治河續說一》、《治河續說二》等。

⑰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見《資料》。

鶚撰寫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有關河工的著作。這些治河的經驗，尤其在山東的經驗，提供了劉鶚日後寫作《老殘遊記》的題材。張曜本人更成為小說中莊宮保（莊曜）的原型。在張曜之後的巡撫福潤極為賞識劉鶚的才華及貢獻，兩次上疏朝廷，為劉鶚爭取至總理衙門應試，以取得資格從事宦途。第一次（光緒十八年，1892），福潤咨送劉鶚去北京應試，因不合例被飭回，劉鶚曾吟詩表對仕途不遂的失望：

魄落魄消酒一卮，凍軀圍火得溫遲，人如敗葉渾無屬，骨似勞薪不可支。紅燭無光貪化淚，黃河傳響已流澌，那堪歲歲荒城道，風雪千山夢醒時！^⑱

福潤在光緒二十年（1894）再次舉薦劉鶚，我們可以稍微留意的是，在福潤的疏中特別標舉劉鶚的博學及其對於洋務的嫻熟：「其所著各書，考據尙屬詳明，有益於用……查該員學術淵源，通曉洋務。合無仰懇天恩，准由奴才將該員劉鶚，咨送總理各國衙門考驗，以備任使之處……。」^⑲光緒同意了。劉鶚赴京考試後，得到一個知府銜，劉鶚與黃河之關係卻似乎已告一段落。資料顯示，劉鶚已將注意力轉移到興建鐵道上頭了。

在通過總理衙門的考試，獲得知府銜後，劉鶚即上一疏建議興建一條鐵道——蘆漢道（由蘆溝橋到漢口）。羅振玉在〈劉鐵雲傳〉中寫道：

君於是慨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建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疏請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為所動。^⑳

根據蔣逸雪《劉鐵雲年譜》，劉鶚於「光緒二十一年秋，赴總理衙門報到」，「光緒二十二年六月，應兩湖總督張之洞召，赴鄂，商蘆漢路事，十月回京建議興築津鎮鐵路。」劉鶚對於鐵道興建於國家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利益，顯然相當期盼，因此甚至在事前即已打點，希望事情能順利推行。根據孔祥吉近著〈劉鶚新史料之發現〉一文中所提出的資

⑱ 此詩前有識語：「壬辰咨送總理衙門考試，不合例，未試而歸，臘月宿齊河城外。」《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鐵雲詩存》，頁 55～56。

⑲ 福潤的奏疏全文錄在〈年譜〉（見《資料》，頁 153～154）。不過，由現有我們可以掌握得到的資料看來，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支持劉鶚有「洋務」特長的說法。比較可能的推測是：福潤為了讓劉鶚有資格參加總理衙門的考試，特別強調了劉鶚的「洋務專長」。不過，我們確實知道後來劉鶚是與李鴻章等所謂的「洋務派」有所往來，也許在此時劉鶚已和「洋務派」有所往來，只是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來支持此一推論。

⑳ 見《資料》，頁 190。根據《小傳》，羅振玉這裡所道與事實有誤，津鎮道要到 1896 年才有建築的計畫，遠比蘆漢道晚多了。事實上興建蘆漢道的建議是在 1889 年由張之洞提出的，但是由於經費與預算，遂不克實施。劉鶚在 1895 年向上海的銀行和商業界集募資金欲興建之。見《小傳》，頁 17～18。

料，劉鶚爲了要推動鐵路的興建，在光緒廿一年（1895，蘆漢及津鎮鐵道均未開辦前）就曾試圖賄賂曾任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翁同龢，翁嚴厲斥責，拒絕了劉鶚的賄賂，並留下了一張字據：「劉鶚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幹辦鐵路，昨竟敢託人以字畫數十件餽余。記之以爲邪蒿之據。乙未五月廿一，燈下。」^①在翁同龢處劉鶚未能得到任何可能的幫助，甚至是被趕出宅院，狼狽而去；在實際的興辦過程中，由於政治及金錢利益的衝突，劉鶚也無法參與到興建蘆漢道的計畫中。^②他提議興建津鎮道的計畫，也因地方勢力的利益爭奪而失敗。^③劉鶚有關詞很能描述其心情：

嘆人生終歲苦塵勞，何以悅吾生？趁朱顏猶在，黃金未盡，風月陶情。長得紅偎翠倚，身世嘆升沈，莫把佳期誤，今夜銷魂。門外雪深盈尺，正錦衾人暖，寶帳香溫。戀昨宵夢好，相報不容醒。看天際瓊飛玉舞，擁貂裘，推枕倚雲屏。梳妝罷，郎歌白雪，妾和陽春。^④

長志不得舒展，低落的情緒，縱情聲色以求慰藉的主題與劉鶚的心情是相吻合的，這類作品在劉鶚整個的作品中是比較特殊的。毋庸置疑，中國文人常常徘徊在仕與隱的兩難情境中，應用此類母題來表心志的作品是屢見不鮮的，劉鶚在此似乎也不例外。在實際生活中，實業上的挫折，對於時人官吏的不解其用心，再加上中日甲午之戰的衝擊，讓劉鶚內心更加感慨萬千。他在這段時間寫於北京的〈春郊即目二首〉詩（1896）很可以表達其心情：

郊遊驟見海棠花，亞字闌干一樹斜。蝴蝶忽然飛屋角，羈臣何以在天涯？千枝翡翠籠朝霧，萬朵胭脂艷早霞。寄語春光休爛漫，江南蕩子已思家。
可憐春色滿皇州，季子當年上園遊。青鳥不傳丹鳳詔，黃金空敝黑貂裘！垂楊跪地聞嘶馬，芳草連天獨上樓，寂寞江山何處是，停雲流水兩悠悠！^⑤

① 見孔祥吉〈劉鶚史料之新發現〉《晚清佚聞叢考——以戊戌變法爲中心》（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180。

② 據劉德隆他們簡要的敘述，我們知道劉鶚係因包括王文韶、盛宣懷等人在內的利益團體的阻撓，不願劉與他們分羹，所以將劉排擠出蘆漢道的興建計畫。見《小傳》，頁16~23。

③ 同註②。

④ 《鐵雲詩存·八聲甘州》，見《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61。雖然這闕詞無法很確切地繫在此年，劉鶚在詞中的挫折感與集中其他詩詞作品相比的話是顯明可見的。

⑤ 見《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44。梁啟超後在上海與劉鶚、汪康年、宋伯魯、毛慶蕃、黃葆年、羅振玉等人的集會中亦吟詩相和：「自古文明第一州，臥獅常在睡鄉遊。狂瀾不砥中流柱，舉國將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塊壘，蟻螭空畫舊牆樓。漏卮真似西風岸，

理想不得開展，加上國事日漸凋弊，劉鶚似乎心情鬱抑。不過雖然有一時的挫折，雖然有一時的情緒低落而需要以醇酒美人來排遣，劉鶚並未就此自暴自棄，他將注意力轉到商場、實業界上去了——只不過終其生他似乎處處不得志，無法充分施展其長才來實踐其理想。劉鶚注意力的轉移也許可以歸因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所造成的政治與軍事威脅，以及其與當時較有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及官吏的來往，這些因素促使劉鶚更加著力於其他面向，強調「養民」，並從而進行可以幫助中國因應世局的實業。

三、致力實業

在幾次興建鐵路的挫折後，我們看到劉鶚大致上已偏向投身實業，離宦途愈行愈遠了。1897年他在一家英國商行（英商福公司）擔任經理職位，從事於山西煤礦開採的工作。因採礦事劉鶚首度遭人彈劾，被清政府革職，也從此被視作「漢奸」。山西煤礦的品質及蘊藏量是早受到公認的。^{②6} 1896年山西巡撫胡聘之請設商務局，由於資金的缺乏，他們向英商福公司借款一千萬兩白銀，劉鶚即是中間人。劉鶚與福公司有密切來往關係主要是因其負責人之一的義大利人康門斗多·恩其羅·羅沙第原為招商局總辦馬建忠的副手，而馬建忠又是劉鶚生平摯友。^{②7} 開礦事業背後當然有劉鶚歷經挫折後的心路歷程及其一貫的養民思想在其中。他曾向朋友提及自己這時的想法及抱負：

蒿目時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為。近欲以開晉鐵（煤）謀於晉撫，俾請於廷。晉鐵（煤）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②8}

劉鶚的想法在當時受到很多人的攻擊，被認為是「賣國」，但是他其實有相當前進的思想及前瞻性。他對開礦的認識相當開通：

工人所得之資不能無用也，又將耗於衣食。食者仰給於庖人，衣則仰給於縫工。庖人不能自藝蔬穀，又轉仰給於農圃；縫工不能自織布帛也，又仰給於織人。如是輾轉相資，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餘萬人矣。我國今日之患，在民失其養一事。

百孔千瘡無底愁。」見《資料》，頁155。

②6 參看《小傳》中引肯德《中國鐵路發展史》，《小傳》，頁24。

②7 劉鶚在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4月14日日記中有一條：「予生平知己，姚松雲第一，馬眉叔（建忠字）第二。」引見《小傳》，頁25。

②8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劉鐵雲傳》，引見《小傳》，頁25~26。

而得養者十餘萬人，善政有過於此者乎？況有礦必有運礦之路，年豐穀可以出；歲飢穀可以入，隱相酌劑，利益農民者，更不知凡幾。我國出口貨值，每不敵進口貨之多，病在運路之不通。運路既通，土產之銷暢可旺，工藝之進步可速，倘能風氣大開，民富國強屈指可計也。而開礦實爲之基矣。

劉鶚不只是言其利，同時也防其蔽，他接著說：

古人云慢藏誨盜。今我山西煤鐵之富甲天下，西人嘖嘖稱之久矣。必欲閉關自守，將來無知愚民燒一處教堂，殺三五名教士，釁端一開，全省礦路隨和約去矣。其中有絕大之關鍵存焉，則主權是也。兵力所得者，主權在彼；商利所得者，主權在我，萬國之公約例也。然有一國商力所到之處，則別國兵力即不能到。今日亟亟欲引商權入內者，正恐他日有不幸而爲兵權所迫之事，必早杜其西漸之萌，爲忠君愛國者當今之急務矣。^{②9}

劉鶚的想法當然有「民富國強」、「以夷制夷」，也有所謂「商戰」的味道在其中。^{③0}因爲自己一貫養民思想，以及報效國家之職志似乎可得而實現，讓劉鶚興奮不已，三次前往太原，而且在幾首詩中表達了溢於言表的心境：

山勢西來太峯嶺，汾河南下日悠悠。摩天黃鵠毛難滿，遍地哀鴻淚不收。眼底關河秦社稷，胸中文字魯春秋。尼山渺矣龍川去，獨立滄茫歲月遒。（〈登太原西域〉）
南天門外白雲低，攬轡東行踏紫霓。一路弦歌歸日下，百年經濟起關西。燕姬趙女雙蟬鬢，明月清風四馬蹄。不向杞天空墮淚，男兒義氣古今齊。（〈太原返京道中宿明月店〉）^{③1}

然而，滿胸的雄心大志卻又因爲地方利益團體的權力鬥爭而不得施展。一方面是英商福公司的洋人經理對於在山西所得之利益感到不足；另一方面則是參與山西開礦的官員，在情緒上反對讓洋人在中國土地上開礦，也擔心所得的開礦利益會落到洋人及中人劉鶚手中，於是上書向朝廷彈劾劉鶚。在總理衙門調查後，光緒皇帝諭令「均著撤退，毋令與聞該省商務」。^{③2}劉鶚的山西開礦又是功虧一簣。不過，相當反諷的是，山西省最後的

^{②9} 《小傳》引自《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見《小傳》，頁26~27。

^{③0} 有關晚清的「商戰」，請參看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收於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1980），頁331~351。亦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集刊》5（1967.6）：頁1~91。

^{③1} 《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鐵雲詩鈔》，頁46。

^{③2} 《小傳》，頁28。

開礦結果卻證明了劉鶚不僅是對的，而且還相當的有遠見：山西礦務局後來還是與外人合作，與當初劉鶚所策劃的方案大致相符，但是卻未能堅持對外商加以限制。^{③③}雖然山西開礦不順利，劉鶚後來還是參與了福公司在河南、浙江的開礦事宜。這些作為後來還是因受到許多鄉紳、地方官吏和愛國的年輕學子的反對而失敗了，理由大致上還是指責劉鶚「賣國」、賺佣金等罪名。^{③④}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在劉鶚是否因擔任中人而賺取了大筆金錢，而更應著重在劉鶚如何將他自己的想法和國家的實際現況結合起來，因為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像劉鶚這樣身處轉折期的知識份子如何對其周遭環境做出反應。在一封公開的啓事中，劉鶚對於自己被指為「賣國」一事有所辯護，同時他也試圖對中國目前的處境及因應之道，提出自己的理念：

僕自甲午以後，痛中國之衰弱，慮列強之瓜分，未可聽其自然。思亟求防禦之方，非種種改良不可。欲求改良必先開風氣，欲開風氣必先通鐵路，欲通鐵路必先籌養路之費，捨農工商礦更有何賴？而農工商三者之利其興也，必在風氣大開之後。緩不濟急，只有開礦一事見效易而收效速，為當務之首矣。然二十年開礦者不下三、四十處，率皆半途而廢。蓋以華人非所專長，故易敗也。又思凡外國商力所到之地，即為各國兵力所不到之處，則莫若用洋商之款，以興路礦，且前可以御各強兵力之侵逐，漸可以開通風氣，鼓舞農工。卒之數十年期滿，路礦仍為我有，計之至善者也，故毅然決然為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所不顧也。其中有利無害情形，前上山西撫帥稟稿言之甚詳，附呈請鑒。^{③⑤}

劉鶚接著馬上指摘那些攻擊他的人無法明瞭兵戰與商戰之區別。劉鶚認為中國在目前階段徒言立即改變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有豐富的資源，若能善加保護利用，使免於列強勢力的侵奪、壓榨，就可以成為救中國的要害。雖然如此，中國目前卻未能具備有先進的科技來開發之，所以最好的途徑即是利用列強的力量來協助我們開發，同時並加以箝制，主權歸我而出力由他。如此「人各有學，學各有宗旨，僕之宗旨在廣引商力以御兵力，俾我得休息數十年以極力整頓工農商務，庶幾自強之勢可成，而國本可立。」^{③⑥}

③③ 山西礦務局《礦案之禍始》檔案記載：「據前輩傳聞，謂當時合同原稿，尚定開辦期限……會中裕進京……倉卒署名，是時合同原稿已變本加厲，無開辦期限矣！」見《小傳》，頁 28~29。亦參見蔣瑞雪〈年譜〉《資料》，頁 157~162。

③④ 請參看《小傳》，頁 30~31。

③⑤ 〈礦事啓〉，見《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132。

③⑥ 同註③⑤。

劉鶚的用心在當時大致上不為大多數人所了解、認同。其實在他內心中也充滿了「不為世所知」的感嘆。他在 1897 年有闕詞描寫至山西的路途及感受，頗能看出劉鶚當時的心境。

丁酉七月由燕赴晉，風塵竟日，苦不勝言，每夕必以弦歌解之

燕姬趙女顏如玉，鶯喉燕舌歌新曲。挾瑟上高堂，娥娥紅粉妝。
倚窗嬌不語，漫道郎辛苦。弦撥兩三聲，問郎聽不聽？
客心正自悲寥廓，那堪更聽蓮花落！同是走天涯，相逢且吃茶。
芳年今幾許？報道剛三五，作妓在邯鄲，於今第七年。
朝來照鏡著顏色，青春易去誰憐惜？挾瑟走沿門，何如托鉢人！
行雲無定處，夜夜蒙霜露。難得有情郎，雞鳴又束裝！
狐悲兔死傷同類，荒村共掩傷心淚。紅袖對青衫，飄零終一般！
有家歸不得，歲歲常為客，被褐走江湖，誰人問價估？

右調菩薩蠻，皆紀實也。男子以才媚人，婦人以色媚人，其理則一。含詬忍恥，以求生活，良可悲已！況媚人而賈用不售，不更可悲乎？白香山云：「同是天涯淪落人」。湯臨川云：「百計思量，沒個為歡處！」我云亦然。³⁷

在詞中藉由弦管賣唱的紅塵妓女媚人求生活的情境，來寫自己挾才「求售」，不為人知，因而「含詬忍恥」的悲愴心理，讓我們看到劉鶚內心較為感性的，寂寞、孤獨的一面。

劉鶚到底是愛國者，關切中國的前途命運，或只是一位投機的買辦、賣國賊，只為自己、為洋商謀利益，當然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探討。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劉鶚的商戰／兵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當時由鄭觀應、王韜等人所提倡的時代氛圍。³⁸根據現有資料，我們恐怕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肯定劉鶚是否受到這幾位先進知識份子的影響，不過我們知道汪康年早在 1896 年在《時務報》即已發表了〈商戰論〉。³⁹我們也知道劉鶚

³⁷ 《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61～62。

³⁸ 有關王韜及鄭觀應的思想及影響，可參看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收於氏著《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1983），頁 135～176；胡秋原〈鄭觀應生平及其思想〉，收於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1980），頁 453～467。

³⁹ 參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集刊》5（1967. 6）：頁 1～91。

曾在上海停留過一段期間，和梁啟超、汪康年等人均有過從（下面對於劉鶚的交遊有更詳盡的討論），^{④①}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劉鶚如果不是直接受到幾位論商戰的維新人物的影響，至少他在上海應該可以感受到普遍瀾漫的商戰論調。雖是如此，劉鶚和鄭觀應、王韜等以及維新派人物的關係仍然有待新資料的出土，方能有進一步的結論。^{④②}

四、劉鶚與維新派的關連

1898年百日維新起，然而很快地被慈禧太后黨推翻了。根據劉鶚侄兒劉大鈞〈劉鐵雲軼事〉的說法，劉鶚在當時「主張徹底辦法，利用外資，從事建設，以開發我國之富源。懷抱既不得抒，遂與保皇黨連絡，希冀光緒帝得復政權，各種新政皆可實施。」^{④③}但是劉鶚三子劉大紳全盤否認了其父與維新派有任何瓜葛。劉大紳宣稱劉鶚「素不贊同保皇黨：謂其運動為本末倒顛。亦無君主思想，與康長素氏僅一面之識，更無連絡之事。」^{④④}此處我們有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分別來自劉鶚的兒子及姪子。到底劉鶚與百日維新有無關連，如果有的話，他和維新派人士又有何種關係？我們可以掌握的資料都無法顯示劉鶚與「戊戌政變」有任何關連。但是資料也顯示，劉鶚與維新派人士來往密切。前面我們提過當1896年劉鶚到京師應總理衙門試，他曾寫詩抒懷，而在返家途中路經上海，與梁啟超、汪康年、宋伯魯、毛慶蕃、黃葆年、羅振玉等人讌集，與會每人各賦一詩相和。^{④⑤}這些人中，毛慶蕃、黃葆年與羅振玉不是劉鶚的同門（毛、黃）即是姻親（羅），而梁啟超、汪康年和宋伯魯均是維新派人士。同年，當汪康年在上海創立《時務報》，

④① 劉鶚曾有一書致汪康年（穰卿），見劉德隆〈劉鶚致汪康年信之我見〉，收於氏著《劉鶚散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02~207。

④② 筆者個人覺得劉鶚和當時其他知識份子應有極度密切的關連。比方說，根據劉大鈞〈劉鐵雲軼事〉，劉鶚本人因父親劉成忠與李鴻章有年誼，曾往訪李鴻章，且有一段「漢奸」的軼事。見《資料》，110~111頁。在《小傳》中，幾位作者甚至懷疑劉鶚與李文忠之間的關係可能是相當親密，所以在仕途挫折或與地方官僚的衝突中，李常常對劉鶚照顧有加。劉鶚也與幾位高官，如李鴻藻、王文韶、倪文蔚等人亦相當熟識。見《小傳》，69~70頁。在另一方面，如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劉鶚與維新派人士來往也極密切。

④③ 《資料》，頁110。

④④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資料》，頁81註11。

④⑤ 《小傳》，頁93。

邀梁啟超主筆，劉鶚亦在上海。宋伯魯在朝廷中是維新的強力支持者，他在 1896 年創始了關學會，此會是維新黨人的機關喉舌。劉鶚與宋伯魯是結盟兄弟，當宋伯魯在 1902 年被朝廷逮捕時，他迅即發電報給劉鶚請求援助，而劉鶚亦在其日記中表示了其關切。^{④⑤}我們對劉鶚與宋伯魯的交遊過程不是太清楚，劉鶚與關學會的關係也不清楚，不過劉鶚與維新黨的另一機關團體「保國會」卻有關連。「保國會」係康有為於戊戌年三月「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議會章程三十條，欲於漏舟覆屋之中，合群以救之，激恥以振之，立憤氣以張之，以伸國憤，而續強學會之舊。」^{④⑥}劉鶚的名字於該年三月出現在《國聞報》「保國會」北京分會成員名單《京城保國會題名記》中。由這些關連及交遊，縱使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劉鶚參與戊戌變法，但他與維新黨有密切關連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個證據可聯繫劉鶚與梁啟超的關係的是在劉鶚日記中的一個條目：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三月廿四日：「歸寓，讀《十五小豪傑傳》，寫書簽。」^{④⑦}根據劉德隆等的看法：「《十五小豪傑傳》是梁啟超用文言翻譯的法國著名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儒勒·凡耳那（當時亦作焦士威爾奴）的長篇小說《兩年假期》……。是書第二年（一九〇三）才由橫濱新民社刊行，由此推之，當是梁啟超將自己翻譯好的稿子，送給劉鶚看，並請劉鶚為其題簽書名。」^{④⑧}此一論斷當可信。

由上面幾條資料，我們雖無法建立起劉鶚與「維新派」的關係，但是劉鶚與他們的交往應是無庸置疑的，甚至在 1902 年與梁啟超都尚有書信來往，而任公當時還是清廷重金懸賞通緝的人物！

根據以上的分析，雖然以現有的文獻資料我們無法建立劉鶚與維新派人士的直接關

④⑤ 壬寅年六月二十日條：「……前日，西安來電云：院臬以『誣訕宮櫺』誣芝洞〔伯魯字〕，以拘拿置獄，祈設法援乎？電到時，密馬〔碼〕尋不著，至今日始獲。急入城見仁和，始知旨係交地方官管束，可謂喜出望外。」六月二十二日：「復得芝洞一電，因急作電覆之。」見《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178～179。根據編者注，宋伯魯是劉鶚的「盟兄」。見頁 209，注 45。有關宋伯魯的生平要略，可參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宋伯魯》，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增訂本。

④⑥ 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康有為梁啟超》。

④⑦ 見《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160。

④⑧ 同註④⑦頁 208，註 35。雖然樽本照雄曾撰文質疑劉鶚見過梁啟超的原稿的可能性，但劉德隆等人的推論應仍可站得住腳。參見劉德隆《劉鶚散論》中，〈劉鶚與梁啟超及戊戌變法〉（頁 94～98）及所附樽本照雄〈劉鐵雲讀過梁啟超的原稿嗎？〉（頁 99～201）兩文。

係，至少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劉鶚與相當數量，而且是關鍵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派人士熟識，往來密切，^{④⑨}甚至與其中如宋伯魯還有結盟兄弟之關係，不過這些訊息不應該讓我們驟下結論，認為劉鶚全然地擁抱維新派的思想，因為劉鶚曾在別的場合提及維新派，而其立場值得我們留意。在一封寫於1902年10月致其同門黃葆年（當時已是太谷學派的領導者），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信中，劉鶚寫道：

弟之於公，其所以同者志也，所不同者學與養也。公能知天，公能信天，此公學養之至也。弟固未嘗知天，弟固未嘗不信天。惟其不能知天，故竟以天下為己任。天下之安危，匹夫與有責焉。今日國之大病，在民失其養。各國以盤剝為宗，朝廷以朘削為事，民不堪矣。民困則思亂，邇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盪之，天下殆哉岌岌乎。^{⑤⑩}

此處劉鶚對於康梁之嚴厲口氣似乎和前面與康梁密切往來的融洽不甚一致，我們如何去詮釋之？較可信的解釋大概是《小傳》作者所提供的。他們認為，在當時有許多太谷學派的成員對於劉鶚所從事的事業、所交往的人物有微詞，因此黃葆年身為領導者，著筆去信訓誡或是要求劉鶚提出解釋。劉鶚的信有相當大的成份是在回復對他的批評，因此必須解釋並為自己的作為、立場作辯解，安撫其同門，並強調他對太谷學派自始至終毫無變易的忠誠。^{⑤⑪}總之，劉鶚與維新派諸人士的交遊與關係如能有更多的資料出土，應該是一個多采多姿、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範疇。^{⑤⑫}

④⑨ 《劉鶚小傳》作者在〈劉鶚與梁啟超、宋伯魯〉中提到曾聽劉鶚孫子劉厚祜說他原本藏有康有為致劉鶚兩封信，但已在文革中銷毀。見《小傳》，頁92。劉德隆在近著《劉鶚散論》中再度詳論劉鶚與「維新派」的關係，見劉德隆〈劉鶚與梁啟超及戊戌變法〉，《劉鶚散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194~198。筆者個人認為劉鶚應與維新派有更密切的關係，不過中國大陸一向的政治氛圍於晚清維新派均採貶抑攻訐的態度，可能相當程度上泯滅了不少珍貴的資料。

⑤⑩ 〈致黃葆年〉，《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300。

⑤⑪ 此信前頭對於此有相當明白的表示：「錫朋三哥家執事：屢奉手教，皆以不謹小節，曲為原諒。諒之者，勸之也，敢不勉諸。聞諸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每蒙不以強同苦我，真知我者矣。弟與諸君子殊途而同歸，必不能共轍者也。……來示云，公力於內，弟力於外，『同為空同之子孫，同培古今之道脈，同身同命，海枯石爛，無有貳心，不以形跡沮，更不以他端為疑也。』誓言也，公由踵趾發出，弟受之至於踵趾。……弟之

五、劉鶚的太谷思想

為何劉鶚要如此聲嘶力竭地為自己特立獨行的立場作辯護？答案必須由劉鶚和太谷學派的關係來查考，因為沒掌握太谷學派的思想絕對無法了解劉鶚的思想。「太谷學派」指的是周谷先生及信奉其思想的信徒所組成的學派。周谷，字星垣，號太谷，一號

所為，幾無一事不與公相反；然至於所以為，竊又自以為無一事不與公相合也。此公所謂不以形跡拘，更不以他端為疑也。……蓋受教在無言之頃，有相感以氣者焉。弟既深自信以能窺公之一斑。故謗滿天下不覺稍損，譽言滿天下不覺稍益，惟一事不合龍川之法與公所為，則怏怏終夜不寐，改之而後安於心，此又不足為外人道者也。……」見註⑤。

- ⑤ 其實太谷學派中人與維新派的關係相當微妙。王汎森在〈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中（頁 151）提到研究太谷學派有兩波。第一波的爭論圍繞在它是否為「宗教」或「學派」，相持不下，最後請出「當時咸認權威的太谷派傳人金天翮」來決斷。根據馬幼垣《中國小說史集稿》，金天翮曾撰有〈周太谷傳〉（頁 17）。這位金天翮即是曾起始《孽海花》前六回，後來將書稿交給曾樸續完的金松岑。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提到《孽海花》原本係愛自由者發起，這位愛自由者，即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翮。」根據魏紹昌在《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33，注二）中的資料：「金松岑（1874～1947），即金一，又名天羽，號鶴舫，筆名麒麟、愛自由者、天放樓主人等，江蘇吳江人。……1903 年在上海參加愛國學社，與鄒容、章太炎、蔡元培等共主推翻清政府，從事著譯，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時作品大都發表於《國粹學報》、《新小說》等刊物。」金松岑顯然與光復會的蔡元培等革命團體有密切關係。而《新小說》則是梁啟超 1902 年在橫濱創辦的小說雜誌。金松岑在《新小說》上的《小說叢話》上發表了許多有關小說的言論。其與梁啟超的關係雖無法確切建立，但相識或熟識的可能性很高，因為撰寫《小說叢話》的成員大多是任公圈子中人。如果金天翮果真是太谷派傳人，則太谷學派傳人到金天翮時又與第三代如劉鶚等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政治觀點上。但是，上面所引資料，以及個人所見資料，均未能肯定金即如王先生所言，為「太谷派傳人」。馬幼垣在其文中補記也只稱「金諒亦太谷中人」（強調為引者所加）。由於許多文獻未得見，只好暫時闕疑。
-

崆峒子，安徽石埭人，生平家世不可考。因為「其學尊良知，尚實行，於陸王為近，又旁通老、佛諸說」，^{⑤③}有論者將之與「泰州學派」王艮等相聯繫。亦有論者因其常引老佛諸說解儒教經典，又上溯其淵源於明代林兆恩的「三教合一」。不過劉蕙蓀（劉鶚之孫，劉大紳之子，祖孫三代皆為太谷中人）斥駁為臆說。他引周谷大弟子張積中在《張氏遺書》中《致泰雲樵書》中論三教關係文字來說明其與林三教思想之異：

其教既異，道亦不同。而欲於兵農禮樂之身，希冀乎作佛升仙之路，明其理則可，成其道則難。夫朝而《楞嚴》，暮而《參同》，出而禮樂兵刑，入而君臣父子，譬之北轍，乃駕南轅，扞不相入，有由然矣。^{⑤④}

再者，根據劉蕙蓀的說法，因為太谷學派所持宇宙觀，主重「身心性命」、「格物致知」之學，屢言「河圖」、「洛書」、「易象」，太谷學派之淵源可追溯至宋代理學，大致上應屬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一脈，與明代泰州王艮一派應無關連。^{⑤⑤}雖然太谷諸賢博學多覽，常援引老、佛以解儒典，但本質上仍深以儒典——尤其是《易經》——

⑤③ 《雲在山房叢書·檐醉雜記》，轉引自《小傳》，頁76。

⑤④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593。馬幼垣在〈清季太谷學派史事述要〉註2中引文略論太谷思想與林兆恩應無淵源，其文如下：「《說庫》大獄記黃崖教匪獄跋云：『周星垣（一稱空同子）之術，似出於林三教。林生明之季，以禪宗陰道合姚江別派，吳人程智（學者稱雲莊先生）實倡導之，從遊極盛，再傳而敗，其徒仍私相傳播不絕，星垣殆燃其餘燼者也。』林三教名兆恩，字懋勛，號龍江，又號子谷子。莆田人。博學工文，能以良背之法治病。生平立說，欲合匯三教，學者稱三教先生。崇禎間，程智（字極士，一字子尚）光其學。上跋引《天山清辨》及全祖望《鮚埼亭外編》，述程智之言行，頗病邪僻狂怪，學無根柢，徒眩人目，誕謬不足信，其學不永，再傳已敗，與周太谷之創派清季，學說固見迥異，師承亦無可考，關係殆微，太谷學派中人，更否其事，此說不知何據，姑存以做參考。」見馬幼垣《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出版，1980），頁14。

⑤⑤ 不過，王汎森也提到，常為論者所提出的太谷學派的三個思想源頭(1)林兆恩的三教合一，(2)程雲章的大成教，(3)明季王艮的泰州學派，其實都和太谷派有類同亦有差異之處，恐怕還有許多可以探索商榷之處。見王汎森〈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5：4（1994.12）：頁152。

為依歸。⁵⁶儒家思想中的「內聖外王」理念在太谷諸賢思想中亦佔重要地位。他們不僅強調要格致誠正，充分修養個人道德，同時也強調要推己及人、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民胞物與」精神。⁵⁷這種精神正是劉鶚的「養民」思想所由來，也是儒家「經世思想」的具體實現。

太谷學派很明顯地具有強烈的政治及宗教傾向，⁵⁸事實上滿清當局也曾多次將太谷教人與叛亂相聯繫，如同治時期有名的「黃崖教案」即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⁵⁹劉蕙蓀在其討論太谷學派思想文中提及，宋代方臘起義時的咒語（「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為李光炘作為「仿影」讓學派中人子弟寫字時臨寫。⁶⁰《小傳》作者亦認為李光炘很可能積極地參與太平天國起義事。⁶¹此外，由於太谷中人一向組織綿密，信仰較特異，往往與外人不類，故常予人神祕之感，將之與通俗宗教迷信相

⁵⁶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91～602。亦可參考同書中所收嚴薇青〈劉鶚和太谷學派〉，頁 637。至於這些思想在文學上的具體表現，《老殘遊記》9 至 11 回中，書中人物及其呈現的觀點基本上是遵循太谷思想作闡發的，可參照。

⁵⁷ 《小傳》，頁 86。

⁵⁸ 王汎森基本上即將太谷學派視為儒家思想的宗教化及通俗化。見〈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一文。

⁵⁹ 根據《劉鶚小傳》，張積中於咸豐六年因揚州戰亂，攜眷入山東，定居於黃崖，講學授徒，四方歸者甚眾，到咸豐十一年，山上已有八千餘戶，積中令築山寨，購武器；又在山外設商號，以盈利養山寨，於是山東官吏往往視之為「教匪」，上書告其與捻軍有勾結。「同治五年（1866），山東巡撫閻敬銘派軍隊萬餘圍攻山寨。山寨中人浴血死戰，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但『合寨死鬥，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等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存婦女幼稚四百餘，婦有行色然，笑語如平常者。獲弟子韓美堂等數輩，皆願從師死，訊無他詞。』」此之謂「黃崖教案」。可參看張曜《山東軍興紀略·黃崖教匪》，收於《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69～575。

⁶⁰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95。

⁶¹ 《小傳》，頁 78～79：「太平天國起義前後十年，他曾隻身遠遊兩廣，到底去幹什麼，沒有任何記載，連他的弟子謝平原在撰寫《李龍川年譜》時，也只好空白了十年。不過，在《龍川先生詩抄》中，卻保留了這十年中寫就的一些詩歌，如：『斗牛望氣使人驚，隱隱龍吟虎笑聲，不用燃藜占太乙，已看災禍犯長庚。紅羊劫海千年動，白馬胥江萬乘迎，定有群仙能指認，五雲深處是瑤京。』『海上濤聲動地來，祥雲冉冉護三台，玉龍捧日占王氣，金風凌煙感霸才。五百歲看名世降，二千年見聖功開，蒼生救得斯人出，莫把西湖當釣台。』從詩意看像是勸人出山，連繫到是年的太平天國起義和詩中的「紅羊」等字樣，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究。」

聯繫。⁶²

周谷有二弟子，張積中（字石琴）及李光炘（字晴峰、龍川）。如上所述，積中入山東黃崖，遂有「黃崖教案」之起，與信徒相與捐軀。李光炘則免於黃崖殺戮，至揚州以授徒為業。

劉鶚首於 1876 年（二十歲）初次科考落第時，在揚州邂逅李光炘，劉鶚雖然為李光炘廣博學問所折，但一直到 1880 年方才正式入門為徒。⁶³在一首描述他如何在李光炘門下研習的詩中劉鶚極其清楚的表露出其「希聖」的大志：

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龍川。雖未明道義，灑掃函丈前。無才學干祿，乃志在聖賢。相從既已久，漸知扣兩端。孔子號時中，知時無中偏。萬事譬諸物，吾道為之權。得權識輕重，處久循自然。因物以付物，誰為任功愆。此意雖淺近，真知良獨難。靈台有微渣，一跌千仞淵。⁶⁴

終其一生劉鶚始終忠貞奉獻推揚太谷理念，絲毫不懈。比方說，當太谷學派重要人物在 1902 年決定在蘇州設講社傳播太谷教義，劉鶚及其師弟毛慶蕃立即擔負起講社開支。⁶⁵在一封致黃葆年的書信中，劉鶚亦相當誠摯地表達了其衷心的奉獻之忱：

聖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公以教天下為己任，弟以養天下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為之。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同為空同之子孫，同培古今之道脈，同身同命，海枯石爛，無有貳心。⁶⁶

除此外劉鶚（以及其兒，其孫），不管是在蒐集、梓印、傳播周谷及太谷諸賢文字著作上，均展現出其與太谷學派密切之關係及奉獻情懷。⁶⁷

至於在劉鶚本人的著作中，我們很難發現其對於太谷學說的演繹發明。比方說，周谷、張積中及李光炘留下了許多有關「身心性命之學」的著作，⁶⁸但是我們在劉鶚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相應的討論。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發現有些太谷學派的政治思想在劉鶚的著作中出現。劉蕙蓀總結太谷政治思想為三點：(1)反封建思想；(2)「富而後教」，以

⁶² 傳說周谷能「煉氣、辟穀，會符咒，能役鬼隱形等等，曾一度為兩江總督百齡當作『妖人』逮捕入獄。」見嚴薇青〈劉鶚和太谷學派〉，《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635。

⁶³ 李光炘觀察劉鶚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見〈年譜〉，《資料》，頁 12。

⁶⁴ 〈述懷一首〉，《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43。

⁶⁵ 〈小傳〉，頁 82。

⁶⁶ 〈致黃葆年〉，《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300。

⁶⁷ 〈小傳〉，頁 82。亦參見劉蕙蓀〈太谷學派的遺書〉，《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603~630。

⁶⁸ 見註⁶⁷劉蕙蓀一文。

養民爲本；(3)爲貫徹政治主張，有建立或取得政權的企圖。⁶⁹劉鶚有多大程度遵循這些理念？劉鶚是否全心服膺？抑或是有所變通修正？

劉蕙蓀所舉太谷學派的反封建思想之一例爲其土地觀念。太谷諸賢反對土地私有制度，贊同土地公有政策。他們相信如此一來，地主階級剝削農民階級的情事可得而避免。太谷學派曾提出「復井田」的主張，不過如以張積中黃崖山聚落觀之，則除了有「土地公有」的理念外，似乎更接近所謂小國寡民，素樸安靜，自然無爲，自給自足，沒有任何政府干預，類似烏托邦的集體社群（communal society）。劉鶚在著作中對於土地制度沒有任何著墨，似乎沒有意見。但是在對官僚主義及僵化的道德觀上，劉鶚倒是和太谷師長輩一樣極爲強烈的表達出他的意見，極盡攻擊之能事。比方說，在《老殘遊記》中，老殘，劉鶚的化身，極爲強烈的攻訐官僚體制。他攻擊的對象包括有所謂的「清官」、八股文、以及科舉制度等。至於對僵化的傳統道德觀念的攻訐，《老殘遊記》第九回中璵姑與申子平的討論則是最明顯的例子。藉由握住申子平的手，璵姑發抒了一段議論來攻擊宋代理學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觀念。她認爲對於人欲的壓抑是違反人性的，而古聖賢對於「愛」或「欲」的看法在《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中最能清楚的表達了出來；她甚至直指宋儒或踵隨宋儒者爲「鄉愿」。⁷⁰這番議論，在某個層次上，可以視爲是對於宋代以降的正統儒家思想的正面攻擊。而此中的意涵其實相當明顯的扣應於太谷學派的教義。⁷¹雖然如此，除了攻擊某些傳統價值系統及官僚體系中的某些不合理之處外，劉鶚也提出一些較新穎的想法。比方說，劉鶚在《老殘遊記》的六回的評語中提出了所謂「言論自由」一詞。他在第一回中也提出了應用西方的羅盤及紀限儀來解決中國日漸沈淪的困境，而此亦成爲劉鶚後來獲致漢奸之名的一個理由。諸如此類的想法及做法當然是和太谷學派的教義是很不相同的。

⁶⁹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91~602。

⁷⁰ 《老殘遊記》，頁 81~82。

⁷¹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600~602。另在對太谷學派思想作爬梳歸納後，王汎森認爲太谷學派「主要以理學雜揉佛老爲主」，但在發展史中「很明顯的有以宋學爲中心逐步轉向反宋學的傾向」：在周太谷的思想中宋學強過王學，但因重實踐故亦重陽明「知行合一」說；第二代北宗的張積中則是「宋學與陽明學兼重」；而在南方的李晴峰（光圻），則「宋學味道淺，而王學味道重」；到了第三代弟子黃葆年、劉鶚時，則「激烈批判宋儒中滅人欲的觀點」。王汎森的分析相當精闢，筆者基本上同意之。參見王汎森〈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5: 4 (1994): 頁 152~155。

至於太谷學派的「養民思想」其實是相當傳統的觀念。大致而言，太谷諸賢所遵奉的是儒家思想中的「養民」思想。孔子一向以養民為要務，從政者之好壞優劣，端視其能否養民為標識。而養民之途徑，則不外乎裕民生、輕賦稅、惜力役、節財用等數事。不過，孔子的「養民」政策並未以擴充個人或國家財富及權力為重心，而是以民生裕足為目的。同時，國家不僅要能養民，也須注重美善品性與行為，因此孔子有「既富而教」之言，也就是說教與養其實是不可須臾分離的。^{⑦②}在上面引述過的致黃葆年的信中，劉鶚所謂的「聖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很明顯的是和孔子的養民觀相當一致。為了要將此種養民的理想付諸實現，太谷諸賢設立了一些小的社區式聚落，藉由耕種及經營小企業來自給自足。^{⑦③}我們看到劉鶚雖然沒有像張積中一樣聚集同僚同好信徒於一處，不過他的許多事業，如設立書店、紡織廠、精鹽公司，以及他對於開礦、鋪設鐵道的興趣及參與，很明顯的是秉持一貫的太谷養民思想。當然，無可置疑的，劉鶚的視野是比其前賢及同儕更為開闊寬廣多了，也就是說劉鶚更能體會到與時漸進，因而能在傳統的養民思想中加入一些必要的變動來因應時代的需求。換句話說，如果嚴格地遵循太谷先賢的教誨，劉鶚的一些作為，比如說與西人合作開礦、開鐵道等事業，很明顯的一定不會為其師友所贊同。這也許是為什麼在給黃葆年的信中他提到「弟之所為，幾無一事不與公相反」，而「弟與諸君殊途而同歸，必不能共轍也」的原因。^{⑦④}

由此封信我們很難確定劉鶚與黃葆年兩人在信中所論辯的議題為何，但是由信函的文義脈絡及語氣來判斷的話，這封信似乎在辯解答覆來自同門對劉鶚的某些作為的批評。雖然我們無法很清楚的了解其中心意旨，但是這封信其實也揭露出劉鶚的一些特質來。大致而言，劉鶚固然深深篤信太谷諸賢的教誨，但是劉鶚卻能抓緊時代脈動，在原有的思想基礎上做變通權宜的調適，甚至有些「驚世駭俗」的提出借外力來振興中國的實業，進而達到養民的最終標的。不過我們也得指出，在本封信中所呈現的那種委婉求諒的語氣也明白的顯露出劉鶚（以及許多晚清「有識」的知識份子）在這轉折時期中不得不面對的困難處境及矛盾。

至於太谷思想中有關建立政權一事，證據顯示在劉鶚之前的諸賢確有此企圖及跡象，不過由現有的資料而言，在劉鶚（或同代的師兄弟）身上恐怕我們無法做任何類似

⑦②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1983），頁64～65。

⑦③ 劉蕙蓀〈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596。

⑦④ 〈致黃葆年〉，《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299～300。有關劉鶚與黃葆年等太谷學派其他門人意見分歧的緊張關係，可參看劉德隆〈試析黃葆年給劉鶚的一封信〉，收於《劉鶚散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20～224。

的推論。劉蕙蓀曾舉了幾個例子來支持其說法，認為太谷幾位重要人物確有強烈政治傾向推翻滿清當政而建立另一政權。比方說，周谷的兩位門生參與並在江西暴亂中身亡；張積中的得力門生在河南暴亂中擔任軍師；以及上面已提及的「黃崖教案」。此外，劉蕙蓀進一步提出，在李光炘生涯中有十年的空白，由李的詩句來揣測，很可能是與太平軍起義有密切關連。^{⑦⑤}不過雖然如此，大部分李光炘的門生均來自官紳階級，而且大部分均有科名或任官職。比方說，黃葆年（李光炘的繼承人）、蔣文田（張積中的繼承人）、毛慶蕃（曾任江南製造局主事，後任陝西甘肅總督），以及劉鶚均為太谷派重要人物，但終其生均未參與任何暴動叛亂活動。劉鶚在《老殘遊記》中還譴責革命黨過於極端，以致腐蝕動搖了國家的根本。^{⑦⑥}甚至劉鶚與維新派的交往也顯示出其反革命，非激進的姿態！

六、結語

雖然劉鶚的生平及作為如上面簡要的描述，極為多采多姿，但是在整個時代中他的定位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他放到整個思想史的脈絡中來考察。清代中葉以降，整個學術的氛圍大致上是(1)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經世思想，(2)諸子學的復興，(3)大乘佛教的興盛。^{⑦⑦}我們在上文中討論過劉鶚個人如何受到太谷學說的影響、浸淫其中，而太谷學派大致上如劉蕙蓀所說的，是篤尊宋代理學家的思想的。我們也略微討論到太谷思想中對於個人道德完善的追求，以及由內而外的「內聖外王」的觀念，在這些面向上劉鶚及太谷諸賢都在儒家以《大學》為中心而發展出來的經世思想範疇中。不過我們也不可忽略了，在晚清的經世思想也包含了富國強國的實用意涵在其中。在此，劉鶚似乎與他同代的知識份子沒有太大的不同。他投身奉獻於實業、工商業的舉止其實可以視作是富國強國的一個途徑，而在這後面的強烈「養民思想」，反應的其實就是經世思想中較不突顯的道德理想。^{⑦⑧}不過我們還是得指出，雖然劉鶚的思想相當大程度與當時的

^{⑦⑤} 見註⑥。

^{⑦⑥} 《老殘遊記》，11章，頁99~103。

^{⑦⑦} 請參看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0~20.

^{⑦⑧} 關於清代經世思想之發展，可參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頁405~486及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論〉，收於《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4）。

經世思想暗和，但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卻不見他提及如馮桂芬、魏源等任何經世思想的重要人物，因此要將之與「經世」派作聯繫似乎也不甚妥當。

至於大乘佛教的興盛以及諸子學的興起，劉鶚似乎沒有文字提及或討論。不過他自己於佛經有相當理解，且在詩中常引用佛經典故，如《老殘遊記》第九回中的六首詩：（「曾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元篇。光陰荏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情天欲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等等），幾乎全用佛經典故。⁷⁹大致而言，他的著作都致力於河工、甲骨文及考古等範疇。⁸⁰這大概是我們在處理思想史上非主流人物的一大困難。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確定的是，因為其思想背景，劉鶚個人的主要關切恰好與當代思想主流中的經世思想合轍，但是他似乎沒有參與到其他層面的主要學術思想的探討。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劉鶚個人對於時代的反應呢？劉鶚和康有為（1858～1927）、袁世凱（1859～1916）是屬於同一世代的人。當他師事李光圻時是 24 歲了，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他則已經 38 歲。也就是說，到 1894 年中日戰爭時，劉鶚事實上已過了人生的形成期（formative period）。在心理學人格發展研究上認為，從青少年到成人這段期間，正是人們知識、情感等各方面成長的重要階段，此時，個人的吸收力特強，對於發生於各人身上或是周遭的人事物的反應及感受也較為強烈，因為這正是像海綿般吸收涵納諸般事物的階段。但是同時，對於事物的深入思考反省的能力及幅度也相對地較為鬆弱。隨著生理、心理及學習認知能力的擴展，人們邁入成熟期；此時思想大致成形，思辨能力加強，對於事物的認知也相對的深固，形成較為篤定的看法，不易受人左右。也就是說，雖然從 1840 年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似乎進入西力衝擊的階段，歷經「師

⁷⁹ 在其他詩中劉鶚也用佛典，比方說，在〈七疊同獄鍾君笙叔錢宋侍御芝棟之烏孫原韻，用以自嘲，亦相嘲也〉：「勘破華嚴五十三，皈依淨土日和南。半弓拓地培新綠，一井窺天見蔚藍。太史書從宮後作，昭明經在獄中參。縱橫馳道無千寸，辜負良朋惠脫驂。」《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8～59。

⁸⁰ 根據《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中〈劉鶚著作存目〉，劉鶚著作可分以下幾類：(1)考古文字類：《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附泥封》、《鐵雲藏印》、《鐵雲藏印續集》、《鐵雲藏貨》等十二種。(2)史地河工類：《治河五說·續二說》、《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等四種。(3)算學類：《勾股天玄草》、《弧角三術》等二種。(4)醫學類：《要藥分劑補正》等三種。(5)文學類：《老殘遊記》、《鐵雲詩存》等五種。(6)音樂類：《〈十一弦管琴譜〉序》以及(7)雜著類。

夷長技以制夷」、引進西方技術、制度等階段，但是基本上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念大致上並未動搖，一直要到 1894 年的中日甲午之戰才產生重大衝擊。^⑧當劉鶚在身心觸鬚最敏銳的形成期時，他的周遭環境氛圍其實是相當傳統平靜。當日本「蕞爾小國」打敗中國時，身為知識份子的劉鶚當然感受到衝擊，我們在上文的討論中看到劉鶚在詩詞中表達他對此氛圍的感受。在 1900 年的庚子事變中劉鶚也有感觸，在〈致陸樹藩四封〉中劉鶚曾寫他聽到友人描繪京師情景而「聞之不自知其淚下涔涔也」。^⑨他也曾有詩寫心情，如〈光緒辛丑六月十七日題日記上〉：「煙柳絲絲覆院門，淒淒切切近黃昏。城中城外人俱病，愁雨愁風客斷魂。百藥不靈無上策，兩花交萎怕中元。柔腸一寸重重結，半向人言半不言。」^⑩只是在許多例子中，他的反應比較接近傳統士大夫。他對於「國之將亡」的危亡意識顯然不如較為年輕的一代，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深刻。同時他對於傳統社會政治制度及價值觀——雖然如上文論及偶而也有嚴厲批判的時候——顯然仍有相當信心，抱持樂觀、正面的態度。不過他也充分理解到接受西學、西方的科技工商業，以之為工具來幫助中國的好處——這些方面解釋了大致上劉鶚是一位具有傳統思考模式的知識份子，但是在某些面向他卻經常保有一顆開放的心靈，留意到現實面的需求。這種特質在某個層面上正好是轉型期光譜分布中較為接近傳統知識份子的特性：在傳統思考模式與新思潮中斟酌搖擺，批判但卻未全盤懷疑傳統價值體系，欣賞西方學術科技卻未曾對中國文化傳統喪失信心。這當然與譚嗣同的「衝決網羅」或是五四時期「全盤反傳統主義」有相當大的區別了。^⑪

總體而言，早期的士大夫，大多於世界脈動一無所知，視外人如蠻夷，到鴉片戰敗後才逐漸瞭解到除了「中國」之外，仍有「他者」的存在，進而邁上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上。在這整個歷史的演變以及變遷中知識份子的反應，尤其是我們瞭解掌握時代脈動的

⑧ 請參看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1978）：頁 475～584。

⑨ 〈致陸樹藩四封〉，《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296～297。

⑩ 〈光緒辛丑六月十七日題日記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頁 57。

⑪ 有關譚嗣同的批判傳統可參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8）及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有關五四全盤反傳統主義，請參考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重要文獻，而不同的知識份子因個人不同遭遇而產生的不同回應，也讓整個文化樣貌顯出各擅勝場、多采多姿的蓬勃氣象。在晚清，有極端保守如王先謙、葉德輝等傳統讀書人，維護傳統文化不遺餘力，視外來思潮為寇讎；也有日漸激烈如譚嗣同、孫中山等的新知識份子，出於傳統，卻不為傳統所拘，試圖擺脫沈重的包袱，為中國開新契機。在兩端之間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如劉鶚等的知識份子，徘徊游移於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之間。劉鶚其人其事其文其行固然於家國大事未能發揮主流知識份子的影響力，雖然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晚清思想的主要發展，但是作為一個有敏感觸鬚的傳統知識份子，劉鶚極為生動的顯現出一個轉型期中知識份子的樣貌，讓我們更深刻的掌握到時代的交織線索。

（本文作者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